

哈代小说人物性格的系统分析*

敏 捷

十九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马斯·哈代(1840—1928)在其“人物与环境”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富有典型意义,颇具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刻画了笔下人物丰富多彩、复杂深刻的性格特征。在哈代小说人物性格的研究方面,过去较多地是停留在对单部作品,单个人物的描述或评论上,且有不少机械片面的观点,本文则尝试着运用现代系统论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借助于系统论的理论框架,对哈代五部代表性小说——《远离尘嚣》、《还乡》、《卡斯特桥市长》、《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中的主要人物性格进行全面、综合的系统分析和理论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哈代小说人物性格中所孕育、包含着的地体的审美意蕴。

一、构成哈代小说人物性格的几种元素

要研究人物性格,首先要正确了解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既然如此,那么人的性格系统就必然打上一切社会关系的印记,这一切印记就是构成人物性格的一切元素。人物性格系统的规律性必须通过人物性格构成元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来体现。哈代小说人物性格复杂多样,绚烂多姿,这种丰富性首先就是由性格的构成元素的丰富性所决定的。因此,探讨哈代小说人物性格,就必须以性格的构成元素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阶级烙印的元素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社会关系往往集中表现为阶级关系,每个人都必然生活在一定阶级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的地位中,其性格也必然打上一定阶级的烙印,这就形成了人物性格系统中的阶级烙印的元素。过去曾对哈代小说人物性格中的阶级属性有强调过头的偏颇,以致于陷入庸俗社会学的泥潭。但近些年来,有些评论者又似乎对性格中的阶级属性的问题采取一种暧昧的回避的态度,甚至对象苔丝、亚雷·德伯、瓦尔伏雷以及特洛伊这类人物性格中阶级烙印的元素十分鲜明且又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事实都加以全然否定。其实,作为“一个纯洁的女人”——苔丝的性格中,积淀得更多的是下层劳动人民的纯朴善良、忠诚坚定的阶级品质;作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方可聊以糊口的农民雇工队伍中的一员,她的生性中“有一种为别人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有一种在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刚毅,而没有经常在哈代的女性人物中可以看到的虚荣和欺诈。”^②她完美而集中地体现了生活在民风淳厚俭朴的威塞克斯地区的乡村无产阶级的本质属性和高尚人格。直接给苔丝带来终身不幸的亚雷·德伯,无疑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纨绔子弟,依靠投机商业发财致富的资产者和暴发户,他蹂躏苔

*因篇幅所限,本文仅是原文第一、第二部分的摘录。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朱雯先生、方平先生、乔泌先生、梅希泉先生的指导,谨致谢忱!

① John Butler: <Thomas Hardy> Suffolk, 1978, P 106.

丝，不但表现了他个人品质上的丑恶，灵魂上的肮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本质特征。如果说，在亚雷·德伯身上主要表现了资产阶级本身所固有的没落腐朽的特征的话，那么在《卡斯特桥市长》中的瓦尔伏雷的性格里，却更多地活跃着当时正在掘起的资产阶级新兴向上的积极元素。尽管在瓦尔伏雷的性格中也存在着资产阶级冷酷无情、诡计多端的特性，但在总体上，他毕竟具有那个阶级上升时期的先进意识，毕竟是代表着当时先进生产关系的“新型的人”。这点常为人们所忽视。

历史时代的元素 每个人都在一定的历史时代条件下生存，必然要承受所处时代的洗礼，性格中也必然刻下某种时代精神和思潮的印记，特别是处在新旧交替、新旧交错、新旧交融、新旧交锋的时代变迁或历史转折的时期，人物性格更会显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这种历史时代的元素尤其潜在地深刻地影响、制约着哈代小说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哈代笔下几乎所有的人物都置身在十九世纪末叶，新的生产关系产生发展，旧的生产关系衰落消亡，资本主义物质势力咄咄入侵，农村宗法社会土崩瓦解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社会动荡的历史岁月里，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世袭的道德观念“同实际的物质增长和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关系之间的连续不断的混乱，从根本上正在加剧。”^① 达尔文“物竞天择”的社会进化论，把人们抛入了一个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之中。这种强大的时代意识同与世无争的田园理想势必形成令人触目的反差色调，而每个人的性格中也就下意识地涂抹上了这一历史时代的鲜明色彩。埃伯森在《田园文学的达尔文变体：哈代的苔丝》一文中把乡村姑娘苔丝视为“日渐衰落的田园生活的代表”，亚雷·德伯和安琪·克莱则是“进化演变过程中不自觉的代理人”，在一场盲目的生存竞争中，性格朴实的苔丝注定要成为狡诈“代理人”的“牺牲品”，田园主

义也注定要在达尔文主义面前大打败仗^②。时代的动荡分化，确定着哈代小说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轨迹，把他们推上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有些人能够驾驭时代的潮流，顺应历史的变迁，就会得到生活的富裕和地位的稳固，如《还乡》中的红土贩子德格·文恩和《卡斯特桥市长》中的瓦尔伏雷；有些人虽也一度使自己的性格适应于时代的浪潮，在历史的嬗变中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但由于屁股上带着无法磨灭的旧时代的胎记，终于穷愁潦倒、消极颓丧……如《市长》中的亨察尔和《还乡》中的克林；更有些人徘徊踟蹰于“荒原”与“都市”这截然不同的时代两极之间，对旧有的生活方式表示厌倦，对新的“文明的”浪漫生涯和繁华的都市生活则心驰神往，渴望并追求自由自在的情感方式和理想境界，“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乐趣比新鲜的景色和新的友邻更使他们喜爱了^③。但最终不是由于“荒原”势力的过于强大而难逃灭顶之灾，就是由于“文明”生活本身的罪恶痼疾而遭到理想的幻灭，如《还乡》中的韦狄和游苔莎、《远离尘嚣》中的范妮·罗宾以及《无名的裘德》中的裘德和淑。在这些人物性格中，常常出现新型时代的意识观念同陈旧凝固的传统习俗之间强烈的不协调，形成不同时代影象的交错叠印，因而人物性格也往往会出现裂变矛盾的情形。

环境条件的元素 不同的环境不仅会造成人物的不同性格，而且对同一个人物的性格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哈代把这五部小说均归在“性格与环境”的小说一类，目的也是为了揭示出环境的元素如何渗透和影响人物

^① Thomas Hardy: the Writer and his Background, Edited by Norman Page, Bell and Hyman London, 1975, P30.

^② J. R. Ebbaston; A Darwinian Version of Pastoral: Hardy's Tess, 载 A. E. Dyson 主编的论文集《The Pastoral Mode》Macmillan, 1984, P 240-246.

^③ 《The Life and Work of Thomas Hardy》by Thomas Hardy, Edited by Micheal Millgate, Macmillan, 1984, P336.

的深层性格。哈代小说中的环境主要指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种，并且由自然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制约、影响逐步过渡演变为社会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制约和影响。环境是影响哈代小说人物性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首先，哈代笔下的自然环境的设置和描写不仅仅为小说提供某种背景，在《还乡》等作品中，自然环境（集中表现为爱敦荒原）更成了人物的主要对立面，因而也就构成了决定人物性格、命运及其发展转变的基本元素之一。“一片苍茫万古如斯！”《还乡》的开篇就有着柴可夫斯基交响幻想曲《弗兰西斯卡·达·里米尔》式的沉郁基调，迟滞低沉的和弦，形象地描绘出那主宰一切的爱敦荒原“这一大片幽静偏僻，老朽荒废的原野”，这一大片“未经骚扰的伟大地区”，带着“它那一味郁苍的面貌，……隐隐露出寂寥的神情来。它有一副郁郁寡欢的面容，含着悲剧的种种可能。”它既有养育人的乳汁，也有毁灭人的威力；它又似乎是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所有生活在那里的人们都必须对它表示某种态度而受到它相应的赏罚：“对于亲近它的人们（少年克林，朵荪）怀有好感，对于那些前来爱敦，有意玷辱传统尊严和真挚感情的人们则铁面无私（游苔莎和韦狄的死亡）。”^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D·H·劳伦斯在《哈代研究》一书中指出：“《还乡》悲剧的真正根源在于荒原。……从深处讲，它原始性的粗暴骚扰才是操纵悲剧的真正力量所在。”^②克冉默也认为：“荒原在广义上可以被看作是现实环境中那种毁灭叛逆者的力量的象征。”^③人物的欢乐、痛苦、理想和追求及其性格的转变都源于爱敦荒原这一自然环境，并常常因为对这一自然环境的感悟而使生命获得新的提升。克林正是出于对气候恶劣、环境严酷但又恢宏壮阔的爱敦荒原的强烈怀念以及对巴黎都市那狭隘、窒闷、喧闹嘈杂的生存空间的厌烦情绪，毅然从文明的巴黎回到荒蛮的爱敦，以实行他改造荒原，造福乡民的

伟大事业。克林“可以说是荒原的产物”，“他对于人生的估价都染上了它的色彩，”“荒原的风景，荒原的物质以及荒原的气味，都把他浸润透了。”一般评论几乎都认为克林的性格同爱敦荒原和谐一致，融为一体，可游苔莎的性格却对这一自然环境具有“永远同它格格不容”的叛逆性。然而殊不知，即使在游苔莎的叛逆性格中，也深深融合进了爱敦荒原的基因和元素：虽然她“很恨这片荒原”，这座给她带来“苦难”和“冤孽”的“牢狱”，“但是它那种郁苍暗淡的情调，却叫她濡染吸收了不少”，并且“和她那种抑郁激愤的叛逆性格正调和”。

其实，在哈代小说中，人物性格同社会环境的主题，也并不因为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描写而有所冲淡或变得模糊不清，相反，哈代也十分重视社会环境元素对人物性格、命运的影响和作用。哈代没有把性格当作先天独立于社会环境而存在的抽象人性的东西，而是把人物性格放在各种社会联系之中去展示它的形成和发展，把它视为特定社会环境中各种力量综合影响下的产物。裘德一生渴求知识，向往理想生活境界的个性遭到扼杀；亨察尔由酗酒卖妻到勤劳致富最后潦倒终生的命运起伏，都可以从不合理的环境以及他们同各种社会代表势力的联系之中找到答案。裘德对淑说：“咱们并不是反抗上帝，咱们只是反抗人，反抗不合理的环境就是了。”苔丝个性特征的转化与演变更是典型地反映了社会环境元素对人的强大的制约影响作用。总之，哈代小说人物性格中的环境元素是双重的而不是单一的（指同时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双重影响），是鲜明

^① 苏联社会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英国文学史 1870-1955》（上）第2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② D. H. Lawrence: 《Study of Hardy》 London, 1982, P44.

^③ Dale Kramer: 《The Forms of Tragedy》, Detroit, 1978, P 48.

的而不是模糊，是深刻的而不是表层的。

命运偶然的元素 这一元素在哈代小说人物性格中占据特殊的地位也是显而易见的。哈代认为：“那些能以人物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和决定命运……的环境深深打动读者的作品，一定对一个健康的人会发生很大的影响。”^①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命运因素和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安排不仅编织着情节发展的结构，而且也促成人物性格及其一生在一夜之间发生骤然的变化和急遽的逆转，一封信，一次偶然的会面，一趟误了点的火车等等“巧合”事件都随时可能决定人物性格及其生活历程的重大改观。哈代认为，人们的喜怒哀乐是由“与宇宙不可分的事态”引起的，在冥冥之中存在着一种冷漠、无情，“不知善恶”的“无意识的推动力”，包括人物性格在内的“世界上的一切发展”都是由它决定的^②。在《裘德》中裘德同艾拉白拉的偶然结合，命运就象“一只力大无比的手”，“以无法抗拒的力量，捉住了他，拽着他走”向灾难的深渊；也正是由于这一命运的安排，使裘德本来“无所顾忌”的性格在对待淑的爱情问题上变得犹豫不定，顾虑重重。在《苔丝》的结尾，哈代写道，“典刑明正了，埃斯库罗斯所说的那个众神的帝王对于苔丝的戏弄也完结了”，把苔丝悲剧归咎于命运所致。在《市长》中哈代更是引用德国浪漫派诗人诺伐利斯的格言明确指出：“性格就是命运。”因此在哈代笔下大多人物的意识观念和深层性格中都带有“凡事都是命定”的宿命色彩，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哈代小说人物性格不是象奥克、朵荪、文恩那样“含辱负重”，惯于“忍受”，“听天由命”，就是象亨察尔、克林、裘德那样从“乐观开朗”到“忧虑”深沉；而且，哈代小说人物性格中只有短暂的明亮相色，更多的却是长久的阴郁基调。

伦理道德的元素 被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经济基础服务的伦理道德

观念，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和伦理规范，也存在着共同的普遍的道德准则，它们都会在各个人物身上留下不同的痕迹，成为每个人物性格系统中的元素之一。哈代笔下的女性形象，诸如露赛妲、苔丝、淑等理应都有权利去获得爱情幸福和婚姻自由，但在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中，社会舆论则往往割断道德义务与情感权利的辩证关系，片面强调道德义务，全然漠视情感权利。这种思维方式带有传统生活中十分鲜明的封建色彩。更重要的是，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及其“积淀”而成的社会舆论偏见的强有力，不仅表现在当事人很难指望依靠这种道德评价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自己应享有的感情权利得到承认和保障，而且这种道德观念还自然而然地渗透、浸润到当事人本身的思想意识深处和性格结构内部，使当事人自觉自省地对自己正当的情感权利进行抑制和扼杀，这在淑的性格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她的个性悲剧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无可否认，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她对悲剧命运的抗争。淑渴望心灵投契，情感真挚，摒弃功利，灵肉一致的美满爱情，于是不顾世俗非议，克服重重困难，离开毫无感情可言的法定丈夫费劳孙，投向她真正的恋人裘德的怀抱。“虽然他们的结合出于伟大的真正的爱情，但他们并不能获得幸福。”^③淑在作出这一骇俗惊世的举动前后，内心一直处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之中，思想性格一直久久地在同费劳孙“履行契约的义务”和同裘德“自发自愿”的爱情之间徘徊

^① 哈代：《怎样读小说才有益》，见《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第3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② 《The Life and Work of Thomas Hardy》，by Thomas Hardy, Edited by Micheal Millgate, Macmillan, 1984, P 36.

^③ 阿尼克斯特：《英国文学史纲》第4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犹豫：“在道德方面”，费劳孙是她可信赖的“好人”，而在“感情方面”，裘德才是她可以委身的“恋人”；她同裘德过着“甜蜜快乐”的“情人生活，”可有时却在心底无端地“觉得自己仍旧还是费劳孙的太太”，终于“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热烈积极的、毫无成见的女人……在责难她跟裘德是‘罪恶的同居’的社会舆论的迫害下，逐渐在精神上投了降。”^①裘德在她思想犹豫、性格动摇的时候曾力劝她“可别为了要讲道德而作出不道德的事来！”“为了爱情，就不能把这种教条式的原则稍稍牺牲一点吗？”然而道德观念上的“有伤风化”的自我谴责，严重束缚了淑的个性发展，彻底摧毁了她原先的叛逆性格和“敢作敢为的勇气”。淑最终“连根拔掉”了她曾经说过的“那些大无畏的话”，她曾经有过的“那些大无畏的感觉”，重新回到了她所不喜欢的丈夫那里，成为供奉在虚伪的社会伦理道德祭坛上的孱弱羔羊，成为庸俗的社会舆论偏见和宗教教条的无辜牺牲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哈代笔下几乎所有的人物性格都被罩在了一张道德伦理观念和社会舆论偏见的无形的罗网里，人物的所言所行无不受到它的支配和控制，不同的只不过是有些人暂时冲破了这张罗网，而更多的人却无辜地成为这张罗网所捕获的猎物。

文化精神的元素 它是构成人物性格系统，尤其是构成人物双方性格和谐统一或截然对立的十分重要的元素。哈代笔下人物大多在爱情或感情方面经历了曲折多变、悲欢离合的纠葛：裘德、淑、费劳孙、艾拉白拉四人之间的聚合离散；游苔莎、克林、韦狄三人之间的感情纠葛；芭斯谢芭、奥克、特洛伊三人之间的恋爱关系；苔丝同克莱的爱情波折等等，都可以看出，他们各自性格中文化层次和精神因素所起的作用。文化精神上的差异往往会导致双方性格和感情的鲜明对立，反之则会使双方性格和感情融洽和

谐。裘德和淑在文化层次和精神世界里具有一致性，他们都顽强地追求个性的自由自主和精神的充分发展，追求智慧和心灵的自我完善，“走向完美的境地”；同时，他们也是“学问深奥”的文化人，他们经常在小屋彻夜长谈各种学问，热烈地探讨人生的志向、意义和生活的真谛，互相领略彼此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需求，他们都感到“自己的精神有了寄托，而这种寄托对他们社会的进展和心灵的进益各方面，都有帮助。”因此他们能够达到精神上的沟通和心灵上的默契，在文化层次上有共同的语言，在双方的性格深处能涌起和谐的共鸣。当然，他们后来出现的感情上的裂痕和危机，除社会压迫的原因外，很重要的也是由于他们的性格中，尤其是淑的性格中原来同裘德完全一致的精神因素，即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叛逆思想，发生了蜕变，从一个热烈追求个人精神价值的叛逆女性降低为成见习俗和道德戒律的可怜奴仆。

处于同一文化层次的人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的性格特征，而处于不同文化层次上的人也会形成不同的性格特征，而且处于高层次文化的人在精神上往往不被处于低层次文化的人所理解，所接受，因而形成性格上的孤僻和精神上的悲哀。克林还乡实现自己的理想不为爱敦荒原的乡民甚至他的母亲姚伯太太所理解，他的兴办学校的教育计划也不为人们所接受，于是“他很悲惨地变成一个孤独的人”^②。裘德想要“出人头地，全国闻名”的志向更是被基督寺教区的一般贫民讥为“古怪”，视为“呆痴”，以至于他不得不在大庭广众申明自己宏伟志向以及悲凉失望的心态，感叹自己“不为人们所理解”。克林和裘德的性格同一般大众格格不入，

^①苏联社会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英国文学史1870—1955》上第2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②苏联社会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英国文学史1870—1955》（上）第2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他们雄心勃勃的理想和壮志也很难得到一般大众的认同，这里不就有文化精神层次上的间距和隔膜吗？！

以上各种性格元素，我们是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方面来论述的，是一切社会关系中几种主要社会关系在哈代人物性格中形成的主要元素。现在进一步需要阐明的是，人不仅是社会的人，也是自然的人，不仅具有社会性，而且具有自然性。马克思主义是在一个总体的意义上强调人的社会属性、阶级属性，却没有否定“单个人所固有的”自然属性、生物属性。“人在发展过程中始终还是生物……他完全生活在双重管制之下。一方面他受社会制度的客观规律的制约，另一方面他又受生物规律、自然规律的支配。”^①因此我们在探讨了哈代小说人物性格中的社会性元素之后，还必须简略考察一下构成他们性格的某些自然性元素。

心理气质的元素 我们在研究人物性格的心理元素时，既要研究社会现实事物对人脑的作用，又要研究人脑对社会现实事物的感知。巴浦洛夫发现高级神经活动的兴奋过程和抑制过程，在强度性、均衡性和灵活性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的不同组合就会形成不同的高级神经活动类型，而表现在人的行为方式上就是气质。哈代小说人物性格既有象亨察尔、克林、裘德那样兴奋热情，易于冲动的胆汁型心理气质；也有象巴斯谢芭、瓦尔伏雷、游苔莎那样开朗活泼，审慎精明的多血型心理气质；既有象苔丝、淑那样深沉安静，含蓄内向的抑郁型心理气质；也有象奥克、朵荪、文恩那样忍耐安祥，坚韧持久的粘液型心理气质。当然这只是大致上的划分归类，而并不否定这些心理气质在每个人的性格中有互相交叉交错的情况以及在后天社会环境的条件下发生转化演变的情况。

心理元素在克莱的性格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世俗的道德偏见

面前，克莱的性格深处实际上展开了两种心理能量——反抗性和从属性——的激烈拼搏，由反抗性的心理能量最终被战胜而导致了其对苔丝的遗弃。然而在新的外部条件下这两种心理能量也会发生转化，一旦反抗性心理能量占了上风，最懦弱的人也会变得坚强起来，克莱最后又回到苔丝身边，是他反抗性心理能量逐渐增强的结果，符合他内在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

哈代在刻画人物性格时有时还会注意生理遗传基因的作用，他曾说过：“性格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②在他笔下的肉性人物性格模式都多少带有一种生物学的倾向；所幸的是，哈代毕竟不是左拉，他笔下的人物也毕竟不是卢贡—马卡尔家族，从苔丝、裘德、克林、游苔莎等人的性格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后天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的影响作用，正如前面已经论述过的那样。然而无可否认，这些生理遗传元素对于构成多层次的人物性格，无疑地添上了丰富多彩的一笔。

在哈代小说人物性格系统中，从理论上除了可以大致分离出上述主要八种元素外，我们还可以找出其他社会的自然的关系在人物性格中的构成元素，诸如血缘血统的元素，情欲本能的元素等等，限于篇幅，兹不赘述。按照系统论原理，这些元素并非单一孤立地存在于人物性格之中，而是互相交错，彼此融合，共同完成对人物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制约功能，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才逐一加以论述，实际上哈代笔下每一个人物的性格都是“完整的集合体”，都是“由要素联系的方式所决定的。”^③而且社会性元素和自然性元素“这两个决定因素——外部的和内部的，外来的和内源的——也处于密切的联系之中，只能在思想上把它们分开。”^④

①瓦西列夫：《情爱论》第30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②转引自陈燕宇：《论托马斯·哈代的〈还乡〉》载《南京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

③④茹科夫：《控制论的哲学原理》第31页，第14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二、哈代小说人物性格的结构方式和建构过程

系统科学方法告诉我们，分析元素是为了进一步研究系统的整体性。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系统整体属性是元素部分属性的完形综合，因此我们在前面对哈代小说人物性格进行了“系统元素分析”之后，还必须对其进行“系统整体综合”，使部分重建整体，确定人物性格的层次结构，构造人物性格的结构模型，而且描述这些结构模型的建构过程。而最主要的是进行结构分析，即揭示系统内部各组元素之间在空间或时间方面的有机联系与相互作用的方式或顺序（静态）以及各种结构方式或顺序的建构发展的过程（动态）。

首先，我们把哈代小说人物性格暂时作为一个封闭的静态系统来进行考察，从人物性格的结构方式方法来阐述哈代小说人物性格的千差万别，千姿万态。

人物性格的整体属性，绝不是各种性格元素的“简单堆积”和“机械相加”，归根结底是由其内部结构方式决定的。正象人们所熟悉的碳黑金刚石和石墨那样，虽然它们都是由相同的碳原子组成，但由于碳原子的结构方式不同，它们的整体性质也就截然不同。同样，哈代笔下有些可以加以归类，互为参照的人物，如苔丝和范妮·罗宾，克林和裘德，德格·文恩和盖伯瑞尔，露赛姐和艾拉白拉，亚雷·德伯和特洛伊，从他们的出身、教养、经历、环境等各方面社会关系来看，可以说，构成他们性格的某些元素基本相同，但是性格迥异，秉性各殊，这也只能从结构方面去加以解释。这里只能大致地归纳、综合、抽象出几种主要结构方式类型，虽属举例性质，却仍可说明哈代小说人物性格结构的多样性。

（一）、同向结构。构成这种性格结构的多种元素在方向上同趋一致，在整体上形成

一股合力，使人物性格的整体属性表现得强烈鲜明，稳定牢固。比如苔丝的性格，不是用一种性格元素的属性可以说明的，而是多种元素在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形成的合力，是多种元素有机组合后的整体属性的体现。在阶级元素方面，她所属的雇农阶级受到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恶势力的压迫和剥削；在道德伦理的元素方面，她受到“成见习俗”的指责和冷遇；在个人心理、生理元素方面，更受到亚雷的一再摧残，这一切就使苔丝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仇恨和反抗的性格比一般人要来得强烈而深刻，多种元素同一方向的合力终于使她的性格发生剧变而发展到杀死无耻恶棍的一步。苔丝的性格结构始终完美无瑕，纯洁动人，其间很少有性格元素分离偏移和自身失误的现象。正由于结构方式的不同，苔丝的性格就比同类人物范妮·罗宾的性格来得稳定深刻，其性格的反抗性也比范妮·罗宾来得坚决有力，因而她的个性悲剧比起范妮·罗宾的个性悲剧来更加令人同情和感叹。尽管范妮·罗宾同苔丝一样也是个天真无邪的农家姑娘，同样也受到资产阶级花花公子、骑兵中士特洛伊的引诱和遗弃，但是她的性格元素的合力凝聚远不象苔丝那样紧密稳固，自身的性格结构偶尔也会出现松弛游移的现象：面对特洛伊的无耻引诱和险恶居心，她不能象苔丝那样毅然加以痛斥和拒绝，而是被这个“士兵的红军装耀花了眼”，出于虚荣享乐之心而投身于他的怀抱；在遭到遗弃后，她也没有象苔丝那样反抗这个加害她一生的恶棍，而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甚至在贫民收容所临终之际还渴望见上他一面。范妮·罗宾的死，固然使人同情，但同情之余，又使人不免对其性格结构的瑕疵和失误感到惋惜和遗憾。

（二）、异向结构。构成这种性格结构的各种元素在整体系统内是对立的统一，它们在方向上并非完全趋于一致，而是在统一的基点上出现异向发展的现象，使人物的整体

性格表现为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哈代笔下这种性格结构类型的人物并不少见，他们的性格都带有多样化、复杂化的表征。同样作为“彻底利己主义的典型人物”^①特洛伊也正是在这一结构方式上同他非常“相似”的亚雷·德伯区别开来，从阶级属性看，特洛伊同亚雷一样，都是作为外部世界的现代资本主义代表人物出现的，都是属于虚伪、轻浮、放荡和玩世不恭的反面角色。然而同亚雷·德伯不同的是，特洛伊性格并非一味呈放单一的色调，他人格的低下、情欲的卑污往往又夹杂着尚未完全泯灭的一丝“人性”之光和“良知”之念，性格的复杂性正在于正反两极的牵连和交织，因为在他的罪恶生涯中确实有过情真意切的时候，有过很难使人归结为无耻或虚伪的内心世界真挚流露的一刻，如他对芭斯谢芭的最初感知和眷恋；再如他对死去的范妮·罗宾表现出来的无限钟爱 and 深深忏悔之情，平心而论，是很难断为虚假做作的。也许在特洛伊罪恶一生中，这种时刻是少见而又短暂的，但人们多少为他这种真正的一闪即逝的对范妮·罗宾的怀念情感所打动，也从中多少可以看到了他身上存在着一点“人的味道”。高尔基说过：“人是本色的，没有纯粹黑色的，也没有纯粹白色的。”象特洛伊这样的复杂矛盾的异向结构类型，正是具有这种杂色的性格特征。

(三)主从结构。与异向结构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是主从结构。一个人的各种性格元素在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绝不会平分秋色、半斤八两，而会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有主从之分。在某种条件下，某种性格元素占据主导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他性格元素则处于次要的从属地位，被主导元素所调节和制约；而在另种条件下，某种本来处于次要或从属地位的性格元素也可能转变到主导地位，使人物的总体性格发生变化。均被哈代归类为“肉欲”型人物的露赛姐和艾拉白拉这两个女性形象也正是在这方面呈现出

尽相同的性格发展。简言之，露赛姐的性格发展逻辑表现出几种不同的性格元素在主从地位上的嬗变更替，因而她的形象更为丰满多姿；但在艾拉白拉的性格中始终只有一种元素——即情欲——占据着主导地位，因而她仅仅是个单一化的“厚颜无耻的妇人”^②的形象。艾拉白拉始则同裘德结婚，继则随情人私奔，最后又胁迫要挟裘德，都是出于一种逢场作戏，虚伪矫饰的情欲，一种“庸俗的卖弄风情”，“她身上的一切，从假发辫和人工酒窝起，一直同对待丈夫和情人的态度，就没有一点点真诚，完全是虚伪和做作的。”^③而露赛姐性格尽管也有作假虚饰的一面(她一出场，作者就重笔描写她的“衣着打扮”，实际上就暗示出她为人的虚饰)，也尽管她最初同亨察尔发生暧昧关系，充满着情欲之气，但良心——道德的元素以及名正言顺的伦理观念有时也会占据其性格的主导地位，因此她在爱情问题上并非象艾拉白拉那样随心所欲，而是一直处在激烈的矛盾之中。她多次拐弯抹角地征询伊丽莎白一杰恩的看法，流露出“凭良心和从道义上讲”必须同亨察尔结婚的自我谴责的矛盾心理。“我不是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露赛姐的这一自我表白，划出了她同艾拉白拉性格的一道界限。小说中有一段议论很能说明良心一道德元素和爱情元素在占据露赛姐性格统治地位上的变化：“这事太明显了，在新的爱情没有插进来以前，良心很有统治的力量，然而这种统治力量被(爱情)夺走了。”

(四)辐射结构。这种结构特点是以某种性格元素为核心、为主调，然后向各方辐射，犹如散点透视，形成人物性格多侧面多

①《Thomas Hardy, The Critical Heritage》 Edited by R. G. Cox, London and Boston, 1970, P 43.

②苏联社会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英国文学史1870—1955》(上)第2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③苏联社会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英国文学史1870—1955》(上)第2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层次的表征。辐射结构类型同前述的同向结构类型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即它们都体现出人物性格发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但是同向结构注重于多种性格元素在方向一致上的合力作用，而辐射结构则更侧重于其中的一种核心性格元素，因而辐射结构类型的人物性格主体性更为突出、集中和鲜明。羊倌盖伯瑞尔和红土贩子德格·文恩都是哈代笔下心地善良，感情浓厚，不计个人恩怨，专为他人着想的威塞克斯农民的美好形象。但是体现在盖伯瑞尔身上的利他主义这一核心元素较之德格·文恩更为明显突出，而且呈现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的辐射状态。德格·文恩确实具有一定的利他精神，但严格地说，他只利于他所爱慕的朵荪一人，他全部的利他辐射线只集中在朵荪一人身上而不及于其他人或其他方面，而且当他偶然听到朵荪将同韦狄结婚的消息时也表现出一定的自私心理，并不择手段地采取了偷听、游说等计谋，而盖伯瑞尔身上的利他主义的核心性格元素却涵盖了各个方面，他不仅对他所爱慕的芭斯谢芭，甚至对所有其他的人都表现出了无私坦诚、见义勇为的性格特点和精神风貌。在小说中，他的温静而又勇敢、稳健而又活泼、“优雅而又得体”、亲切而又平凡的多种性格表征，都是以利他主义的美德为核心元素，从而形成了他性格多方面多层次的辐射结构。

辩证系统观认为，不论自然、社会，还是个人，任何系统在本质上都是开放的、动态的。封闭的静态系统是相对的、表层的，开放的动态系统才是绝对的本质的。因此，我们在把人物性格结构当作封闭的静态系统研究之后，还必须把人物性格结构当作开放的动态系统进行研究，也就是说，要研究哈代小说人物性格系统的运动过程，或称建构过程，即人物性格系统在外界环境和各种关系的支配、作用下的内部矛盾冲突及其发展变化，从中挖掘出所以会形成上述人物性格结构类

型的内在原因。

哈代小说中有些人物性格的建构过程集中体现为复杂多维性。建构这类人物性格的各种元素彼此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各个元素环并不紧密相联，环环相扣，形成的元素链也多有脱漏和空隙之处，而且往往在外界环境的作用下时常会冒出新的元素环，来破坏或填补原有的元素链，因此有序度低，人物性格的外观上表现出复杂多维的无序状态。象芭斯谢芭、游苔莎、淑、克林，甚至特洛伊等人的性格都大体上经历了这种建构过程。他们的思想性格并非清一色的形成，而经常受到阶级的、社会的、家庭的、时代的、自然的以及个人自身心理生理等各方面元素的影响和制约，其性格结构对于外界环境所施加的“输入信息”也不能完全加以同化、吸收，使之纳入其原有性格结构发展方向的轨道，而是出现撞击、矛盾和逆向游离的现象，破坏了原有性格结构的有序度，从而形成他们性格世界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冷漠的爱敦荒原和繁华的巴黎都市这样矛盾对立的外部世界促成了游苔莎矛盾复杂的思想性格：既要向荒原表示出迁就之意，又要向巴黎表示出向往之情；既惧怕荒原的“报复”。不敢贸然独自出走，又舍不下对巴黎生活的“心驰神往”，企图借助克林来实现这一目的；既感受到“爱敦荒原的美丽”，“吮吸了它的不少乳汁”，又感到在“爱敦荒原这种凡间尘世，显然无用武之地”。在这种矛盾心情的折磨下，“她的性格就发展成激偏的一路”而让人“捉摸不定”，难以把握。尽管长期受到荒原农村古老习俗的浸染，但游苔莎的性格结构对于新的外界环境元素（即巴黎都市生活这样的新的环境“输入信息”）却很少有“同化”和消受的能力，面对巴黎都市这样的全新而又陌生的世界的诱惑，游苔莎就不能象朵荪、德格·文恩以及阉特大爷那样“安分守己”，不为所动，相反，她原来的“荒原”

性格链松动了,脱落了,她渴望有朝一日能飞到这个虹霓掩复、灿烂缤纷的都市巴黎。游苔莎这种浮动无定的矛盾性格集中反映在她对克林的爱情变化上,表现出从狂热地追求克林到彻底地离弃克林这两种水火不容的性格极致。人物性格建构过程中的复杂多维性实际上就是按照“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基本命题,强调人物性格随着情景的变异而变异,在此一情景中是一种性格表现,在彼一情景中又是一种性格表现,从而形成了性格流变的复杂多维性。芭斯谢芭在田野向特洛伊求爱时的卑微自贱;在农场向工人指派任务时的盛气凌人;在农场兴旺时的踌躇满志以及在财产受到暴风雨威胁时的焦虑暴躁;在赶走盖伯瑞尔时显得冷酷无情,可一旦在她形影相吊,独处一室时,一种莫名的孤独感、失望感伴随着“缕缕惆怅和思念”又占据了她的心灵世界。“构成芭斯谢芭性格的许多特点中明显地混杂着不同的成分。”“她固有的性情原来几乎是没有什么东西的。”芭斯谢芭在不同场合,不同情境中所表现的不同面目,不同态度,使她的性格呈现出曲折多变的流动状态和复杂多维的矛盾特点:矜持而温顺;色厉而内荏;精明而愚蠢;果敢而软弱。“女主人公这种矛盾的、活泼的性格特征”^①真可谓“捉摸不定,没有常性了”。

总之,这些人物性格的复杂多维的建构过程,就是表现为各种性格元素伏线的网状交织,千头万绪的多种复杂性格现象的并举代替了单向一维的性格现象的延伸,从而造成人物性格纵横交错、跳跃起伏的多维格局。

哈代小说中有些人物性格的建构过程中体现为主导指向性。从一般意义上说,哈代小说人物都具有复杂性,都象是一部概括深广的多声部的交响曲,但复杂性则不会破坏、淹没人物个性的鲜明性,因为即使是一部复杂的交响曲也总有一个贯穿始终,回旋

于各个乐章之间的主调,“就性格本身是整体因而是具有生气的这个道理来看,这种始终不一致正是始终一致的,正确的。因为人的特点就在于他不仅担负多方面的矛盾,而且还忍受多方面的矛盾,在这种矛盾里仍然保持自己的本色,忠实于自己。”^②因此,哈代在描写人物性格时,既真实地描绘出人物性格复杂多维的不同方面,又力求在“特定的人物身上找到稳定的性格特征。”^③

建构这类人物性格的各种元素彼此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各元素环的藕合一般不易改变,形成的元素链也少有脱漏和空隙之处,因此有序度高,性格结构不仅比较稳定,而且对外界环境的新的“输入信息”能够加以同化、吸收,能够自我保持性格发展、演变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在受环境制约的同时,也能对环境产生作用,于是这类人物性格的外部形态既和谐一致,又鲜明突出,而内在的主导指向性则尤为清晰可见,易于把握。比如在苔丝、盖伯瑞尔、德格·文恩等人的性格建构过程中,利他无私的思想性格形成了稳定牢固的联系,但这一思想性格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是在外界环境的作用下保持自身稳定地向前发展,并主观努力地改变客观环境。作为理想化了的女性形象苔丝无疑是美的象征和爱的化身,代表着威塞克斯人的一切优秀的方面:美丽、纯洁、善良、质朴、容忍和坚韧,具有“用自己的双手同生活搏斗的勇气”。苔丝性格的这种主导指向性在她一生的各个阶段都一再表现出来,一直规范和确定着她性格发展的流向和趋势,因而显得稳定持久,鲜明突出。即使她最后愤怒地杀死亚雷·德伯,敢于同迫害自己的环境和命运抗争,也是由于

^①苏联社会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英国文学史1870—1955年》(上)第2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②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395页

^③高尔基《无产阶级作家文集》序·《论文学》续集》第1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她性格主导指向性的制约所产生的必然性转变。(这在下文再作论述)可以说,苔丝的性格世界里并不存在善恶、美丑两极交融的复杂状态,呈现出稳态的苔丝性格结构在外界“输入信息”的影响下,(如亚雷的引诱、克莱的遗弃、道德舆论的压力等等)并不轻易地发生偏离、脱轨的矛盾现象,而是始终如一地保持自重自爱、坚韧不拔的思想品格和精神风貌。同苔丝一样,盖伯瑞尔、德格·文恩等人的性格建构也经历了这种开放性的动态稳定的发展过程。

强调人物性格建构过程的主导指向性并不意味着人物性格的一成不变或单一平板,相反它们也仍然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充实和发展。青年石匠裘德和苔丝有相同之处,即都是“自然之子”,淳朴、真挚、热情,其性格的主导指向性就是追求个性的独立自主和精神的充分发展,力图“照着自己的方式生活”,达到智慧和心灵的完善。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裘德理想的一步步破灭,其受主导指向性制约的思想性格也在逐步地发展演变,日趋成熟,对环境的认识和批判也在逐渐地深化,从而完成了他从富有仁爱的善良性格到桀骜不驯的叛逆性格的发展过程。

总之,人物性格建构过程中的主导指向性就是指人物性格的发展演变被其内在的本质规定性所笼罩、所制约,各种零散的性格表象,以此内聚为整体的、有机的、连贯的性格统一体,合成为有序的一致的牢固的性格稳定态。性格的主导指向性不仅同样会促成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而且本身也会在性格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屡次三番地表现出来,从而使人物性格取得同一调性,透示出一种永恒的基调。

哈代小说中有些人物性格的建构过程集中表现为**遽变转化性**。它既不象复杂多维的性格那样呈现出性格的前后矛盾,也不象主导指向的性格那样呈现出性格的前后统一,

而是人物在外界环境和自身心理的作用和影响下呈现出性格的前后转化。这类性格的建构过程“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向每个他者(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转化。”^①象博尔伍德、瓦尔伏雷、苔丝、克莱以及亚雷·德伯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这种遽变转化的性格建构过程,当然,他们性格的遽变转化存在着真实与非真实,必然与非必然的本质区别。

建构这类性格结构的各个元素彼此之间的联系前紧后松,元素的有序度前高后低,原有的性格结构在外界环境和人物本身心理的作用下往往到后来会进行自身的调节与调整,部分地改变原有的性格结构,提高有序度,使结构达到新的稳定,这样便造成人物性格在发展的轨道上出现某种遽变和转化,有时甚至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转化。这里,外界环境的作用尤为重要,而心理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因为“每一个结构都是心理发生的结果,而心理发生就会从一个较为初级的结构转化为一个不那么初级的(或较为复杂的)结构。”^②从博尔伍德原有的性格结构所表现的功能来看,它具有宗法制社会的正统品性:“忠厚老实”,不善动情,“有足够的地位和名声”,且“品行超卓”,“受人尊敬”,一言一行刻板规矩,富有理性。“他的性格给人的初步印象莫过于平静。也许就是这种平静曾经在两个巨大的对抗力量之间起过最理想的平衡作用——积极力量和消极力量获得了适宜的调节。一旦平衡被破坏,他便立即会转向极端。一种情绪只要附上他的身,便会把他控制住,他的感情不是停滞就是奔泻,从来不是缓流。”很明显,博尔伍德的思想性格结构曾经一度还是有序的,可是自从收到巴斯谢芭漫不经心所写的“请娶我”的圣瓦伦丁卡片以后,他觉得“有一种突然的激情在慢慢地破坏着他生

①列宁:《辩证法的要素》,《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08页。

②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第42页。

活的平静”。尽管他也知道，圣瓦伦丁卡片不过是情人节时男女打情骂俏的“儿戏信”，却信以为真地追查它的主人。他平衡的心理发生倾斜，宁静的内心受到搅扰，一下子“踏进了感情受了伤害的恋爱者的地狱的门槛”，在爱情问题上从理智的约束忍耐转变到对芭斯谢芭的狂热追求，性格起了急剧的变化。他对过去“不曾看上一眼”的芭斯谢芭的爱已经发展到一种荒谬的病态程度，整天神思恍惚，甚至走路都失去了以往那“稳健安闲的步伐”，“显得又迷惑又呆滞了”。哈代也不得不惊叹：“象博尔伍德这样性格平静的人，竟然会在感情上掀起这么狂暴的惊涛骇浪，实在是难以理解的，可怕的。”特洛伊中士闯入后，他眼看与芭斯谢芭的结合就要成为泡影，于是再也顾不得自己的庄主地位、绅士风度和“优雅举止”，思想性格完全转到了“既无条理，又无连贯性的极点”，终于“豁了出去”，开枪打死了特洛伊。在枪声中，他遂又平静下来，重又“迈着均匀、平稳的步伐”走向监狱的大门。博尔伍德性格的两种极端倾向的遽变转化无疑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和自身心理的支配，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再到有序的性格发展过程。

哈代小说人物性格建构过程中的遽变转化存在着真实与非真实，必然与非必然的本质区别，这集中表现在《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几个人物身上：苔丝从一个容忍温顺的弱女子转化为敢于手刃仇敌，反抗命运的女强者；克莱从一个“本来有先进的思想，善良的用意”的青年，转化为囿于资产阶级道德规范而冷酷抛弃苔丝的“成见习俗的奴隶”，复又转化为冲破偏见束缚，同苔丝重叙旧情的勇敢者；亚雷·德伯从浑身充满肉欲之气，肆虐凌辱苔丝的无耻恶棍，居然转化为良心发现、改恶从善的虔诚牧师，这里尽管表面上都属于转化。但实际上转化的中介和基础并非完全相同，就是说，他们中有的性格转化是

真实的必然的，有的是非真实非必然的，有的则是偶然的半真半假的。我把这三个人物的性格转化分别归纳为必然性转化、戏剧性转化和虚幻性转化。

苔丝的性格属于必然性转化，在其转化过程中起作用的是现实生活的逻辑，是不以人物和作家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她杀死亚雷这一偶然之举，恰恰符合人物性格在主导指向性制约下发展的必然逻辑，而转化的中介和基础则是现实生活的逻辑，因而显得真实可信。一时的激怒，盖源于几载的积怨；偶然的表层下面，掩藏着她一贯爱慕克莱和一贯仇恨亚雷的必然。从苔丝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环境对人物性格形成必然性转化的巨大作用。

克莱的性格属于戏剧性转化。其转化的机缘来自于人物内心的天良发现和道德忏悔，具有偶然性。它既无牢固的思想基础，又无必然的生活依据，只不过为了寻求惊人的戏剧效果。当然这种转化也并非完全虚假或不可能，因为偶然的存在并不等于完全不存在，因而这种转化笼上了一层半真半假的戏剧色彩。克莱的两次转化，尤其是后一次转化缺乏现实生活的必然逻辑和思想发展的稳固基础。如果说克莱第一次转化（对苔丝的遗弃）尚有某种现实依据可言的话，（即他从小受到“道德训教”的熏陶）那么第二次转化（重回苔丝身边）则全然出于内心的忏悔和天良的发现。仅仅读了苔丝那封如泣如诉的信后，他立刻内心负疚，良知猛醒，带着悔罪的心情，立刻去寻回他失去的爱。极端的冷酷顿时变成极端的温情，似乎克莱“从小就接受的”根深蒂固的道德偏见在一夜之间便顷刻瓦解，彻底根转。这里，思想演变的必要基础和现实生活的必然逻辑显得非常薄弱，更多的倒是作家或人物的主观意愿在背后操纵，这就使这种转化区别于必然性转化。

亚雷的性格则属于虚幻性转化。如果说戏剧性转化还有某种转化的可能性，那么虚

幻性转化则是完全不可能的，它不是缺乏而是根本没有转化的思想基础和现实依据，其转化的中介——无论是外界环境的影响还是自身心理作用——都不复存在，因而这种转化毫无真实性和可信性，完全是虚假的。破坏了苔丝贞节的花花公子亚雷四年后居然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信徒和宣道者，竟恬不知耻地向苔丝讲述自己“是怎样悔悟过来的”。而罪恶的本性和荒淫的性格却依然如故，并未转变。苔丝就不相信他会改恶从善，立地成佛，她愤怒地斥责亚雷：“我不相信你会变成了好人，我不相信你玩的这套宗教把戏。”哈代本人也不相信：亚雷“这时候与其说是洗面革心，不如说是改头换面”，在俗服和道袍的不断变化下包藏着一颗始终未变的罪恶祸心，在无耻和忏悔的不同面目下荡漾着前后如一的狂暴情欲，如果一定要说亚雷·德伯的性格有所转化的话，那么就只能是这种表面在变而实质未变的虚幻性转化。

总之，人物性格建构过程中的遽变转化性就是指在外界环境的作用下人物性格的对立面互相转化的关系，其中有些性格通过转化，本质地改变了原有的性格结构；有些则是补充或完善了原有的性格结构；而有些则依然是原有性格结构的翻版。这种遽变转化使哈代小说人物性格呈现出流动的变化的韵味，抹上了丰富多彩的色调。

哈代小说中有些人物性格的建构过程集中体现在螺旋循环性。建构这类性格的各个元素彼此之间的结合松紧适度，富有弹性，形成的性格元素链既不会因过紧而断裂，也不会因过松而脱漏。这种“弹性”特点，使得这类人物性格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包容性和柔韧性，往往会“弹”得很高很远最终又落回原点或始点。又因为时空条件的转换和外界环境的作用，这类人物性格的发展就会显得直上直下，大起大落，但又很难把他的性格纳入由好变坏或由坏变好，由积极到消

极或由消极到积极这样一些简单的发展模式中去，只能说是螺旋式地前进，波浪式地发展，看上去就象是循环往复地“绕圈”。这类人类物性格的建构过程在哈代小说中并不多见，恐怕最为典型的就《卡斯特桥市长》中的主人公亨察尔的性格发展过程了。

相信“性格就是命运”的亨察尔一生充满着大起大落，直上直下的命运起伏，从最初一文不名，受人雇佣的穷打草工，一下成为富有而显赫的卡斯特桥市长，而后又一下从这个高高的“出人意料的的社会地位”上跌落到社会的最底层，再次成为一无所有，受雇于人的“破产者”，最终在孤独中悲惨死去。这里，“作家很巧妙地运用了循环结构的原则”，^①使得亨察尔的性格命运犹如一曲连绵无尽，反复回旋的曲式。亨察尔的性格历程每每地出自离心力地向前运动，却始终又是每每地向心折回。他努力想摆脱原来的贫穷酗酒的亨察尔，改变他“暴躁烈性”的性格，但绕了很大一圈后，竟然又循环到本身的始点，性格似乎也回到“刚愎固执”、“任性而不能自制”的原貌。亨察尔的悲剧命运，正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那样，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性格本身的弱点造成的，但是在其性格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很难说他的性格此一阶段变好变积极，彼一阶段又变坏变消极，而只能说是同一性格的循环流变，短工亨察尔的性格和市长亨察尔的性格都一样使人喜爱，也都一样使人讨厌。因此哈代在小说中对亨察尔进行道德评价时，没有使用对苔丝那样的赞美之词，也没有使用对亚雷那样的针贬之词，而仅仅称他为一个“有气节的人”。

应当指出，作为一种性格建构的动态过程，循环往复也并不意味性格仅仅是原地打转，毫无演变，相反它也在曲折地螺旋式地发展，缓慢地波浪式地前进，看上去是某种

^①苏联社会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英国文学史1870—1955》(上)第2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性格的复归，命运的轮回，但实际上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更深意义上的复归和轮回。在小说里，哈代毕竟描绘了亨察尔这“一个生动的、复杂的性格，指明了它的发展过程”，^①而且“是以他的性格的内部矛盾为转移的。”^②在亨察尔大起大落的一生中，外部环境的变迁同样是他性格运动的外部动力，内心世界的矛盾拼搏则是他性格运动的内在依据。虽然亨察尔性格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循环，但人们从中仍可以看到在外界环境和时空条件的作用下，他的性格内部，尤其是灵魂深处孕育潜伏着不断突破自身，又不断回归自身的双向逆反的心理运动，在循环往复的外观下，呈现其性格的螺旋式发展的内在过程。

总之，人物性格建构过程中的螺旋循环性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是这类人物性格的发展在外观上仿佛是一个周而复始的“怪圈”，人物性格随着“怪圈”绕了一圈后，又似乎回到了各自原来的轨道上；二是这类人物性格仍具有内在运动的机制，不同的时空条

件和外界环境的作用也仍然会使人物性格内部和心灵世界产生裂变，引起矛盾冲突，从而推动人物性格螺旋式地向前发展，在更高更深的层次上完成人物性格的“复归”。

综上所述，我们在剖析哈代小说人物性格构成元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描述了哈代小说人物性格的四种静态的结构方式和四种动态的建构过程，这都属于举例性质，我既没有、也不可能勾勒出它们的一切。我无非想通过抽样举例来说明哈代小说人物性格构成元素的丰富性，静态结构方式的多样性以及动态建构过程的复杂性，从而对哈代主要几部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作出较为全面、系统的观照和分析，以期使人们能够对哈代笔下众多的人物性格有一个总体的而不是单一的，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认识，能够从整体上去揭示和把握哈代小说人物性格中生发、透示出来的审美意蕴。

^{①②}苏联社会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英国文学史1870—1918》(上)第2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

(上接第40页)

乾隆三十年以后，称他为王文简公的，渐渐多起来了。

别人称呼他的

(九) 新城尚书 王新城至於新城尚书的称号，由于他是新城人，又当过刑部尚书，所以也有人叫他做新城尚书，或者‘王新城’但这种叫法並不常见。

以上几种称号，除了子真、豫孙、士微外汪文都提到了。但是王士禛的名号，还有以下几种称谓

(十) 王桐花

又有人以他填词中的两句来称呼他的。王士禛曾经填过《蝶恋花》词和李清照(1081

一?)韵，其中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二句。与他同年登弟的刘体仁於是戏呼王士禛为“王桐花”《说铃》记载了这件事。

(十一) 王三绿

王士禛的词又有“春水平绿”“梦里江南绿”、“新妇矾头烟水绿”等句。邹程邨则又戏称做“王三绿”。^①

(十二) 王十一

汪琬(1624—1690)更以王士禛的排行称他为“王十一”的。^②

他的名号，总共计起来十八个。

^①事见王昶《今世说》卷四。

^②汪琬《说铃》常常称呼王士禛做“王十一”。